

黄天：中国抗战文艺的开拓者

刘力勤



睹反动派抓捕、杀害革命者的行径，内心充满愤慨，与进步青年徐信、共产党员周定一结为莫逆之交。三人因得知方志敏组织红色游击队，便以“三五剧社”为掩护，计划奔赴革命根据地，这也是剧社成立的初衷。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后，红军抵达陕北的消息传来，周定一率先前往延安，1937年9月从肤施寄回陕北公学招生简章，让黄天与徐信心潮澎湃。

彼时的黄天，拥有稳定的工作、可观的收入，却也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：妻子病逝后留下两岁的女儿，还有3位侄女需他照应，年迈的父母盼他尽孝。但在抗日救国的大义面前，他毅然告别安逸生活与至亲之人，于1937年11月奔赴延安，与徐信在陕北重逢，自此踏上革命道路，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。

陕公明珠： 开启文艺为人民服务之路

延安是革命青年的向往之地，黄天进入的陕北公学（简称陕公），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型革命干部学校，被毛泽东主席赞为“有了陕公，中国就不会亡”。在这里，黄天接受了系统的政治与军事教育，聆听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教诲，延安军民艰苦奋斗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，让他深受鼓舞，遂将名字改为黄天，彰显抗日救国的崇高志向。1938年，黄天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毕业后留校负责政治与文化艺术工作，同年8月出任陕公流动剧团团长，开启了革命文艺的实践之路。

剧团成立之初，黄天便明确“流动”办团方针，带领团员排练《游击队长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抗日剧目，还组织团员学习陕北方言，让演出更贴近群众。早在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前，黄天就率领剧团下乡演出，践行文艺与工农结合、为工农服务的理念，根据群众素材创作的歌剧《送郎上前线》，用陕北民歌曲调演唱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黄天对革命文艺的一大贡献，是推动高尔基名著《母亲》首次登上中国文艺舞台。剧作家田汉曾为《母亲》改编话剧却仅完成序幕，1939年初，黄天根据校长成仿吾指示，组织侯金镜等同志集体创作，完成五幕四景话剧的改编，并亲自担任导演、饰演主角米哈伊尔·符拉索夫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排练，《母亲》于1939年5月1日正式演出，大获成功。该剧塑造了俄国无产阶级英雄形象，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革命豪情，不仅在校内连演多场，还走进农村赴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演出，受到广泛赞誉。

在黄天的率领下，陕公流动剧团培养了郭维、章文龙等一批革命文艺骨干，被成仿吾校长誉为“陕北公学的骄傲”“值得载入校史的一颗明珠”，黄天也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文艺开拓者。

千里挺进： 从延安到华北敌后战场

1938年底，党中央决定派遣陕甘宁边区主要大学师生挺进华北抗日前线，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四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。1939年6月，黄天率陕公流动剧团与鲁艺部分师生合并，组建华北联大文工团，任团长兼党支部书记。7月，毛主席为联大师生作重要报告，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欢送晚会，黄天率领新组建的文工团献上首场演出，随后便踏上了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千里挺进之路。

行军途中，文工团被编为三连，黄天任连长，他带领团员渡过黄河天险，翻越云中山、吕

梁山，穿越日军“钢铁封锁线”，忍受饥寒劳累，在深山冷雨中艰难跋涉。作为党政负责人，黄天不仅与团员同甘共苦，还组织行军途中的演出，安排宿营站岗、查哨，付出了更多心血。经过3个月的艰苦行军，文工团于10月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阜平县，为华北联大开学典礼献上精彩演出，迅速融入敌后抗日斗争。

1939年11月，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冬季“扫荡”，黄天组织文工团突击赶排《黄河大合唱》等节目，深入战地慰问胜利之师，使作品在边区广泛流传，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。1941年，黄天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科科长，将工作重点转向部队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，调整文艺组织机构，在各分区设立文艺干事，组建群众性文艺组织，推动部队文艺工作蓬勃开展。

他还牵头提升文艺作品出版水平，将《战地文艺》由月刊扩为半月刊，推动各分区创办《文艺轻骑》《火线文艺》等文艺副刊，编印剧本、歌集下发连队，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模范干部。1940年，黄天当选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，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文联执委，1942年出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，成为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的核心组织者之一。

1943年8月，为加强冀东根据地文艺工作，黄天受命调任冀东军区尖兵剧社社长。从相对稳定的晋察冀模范根据地，到日军严密控制的残酷游击区，黄天深知此行的危险，却二话不说收拾行装，慨然赴任，将革命文艺的火种带到了冀东边抗日战场。

尖兵之魂： 让文艺在冀东敌后绽放光芒

冀东是华北连接东北的战略要地，日军长期实行殖民统治，到处碉堡林立、壕沟纵横，部队天天转移，时时战斗，尖兵剧社的活动始终处于高度流动、十分残酷的环境中。剧社成员多是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多数从未摸过枪，还有一些女同志。为了让剧社适应游击环境，黄天明确“先学会生存，再学会战斗，才能坚守文艺阵地”的原则，抽调有战斗经验的同志组建战斗班，规定全员轻装、10分钟紧急集合，甚至细化到宿营洗脸时“洗一只、穿一只”的细节，使剧社实现了高度战斗化、军事化。

作为尖兵剧社社长，黄天既是文艺工作组织者，也是对敌斗争指挥员。从1943年秋开辟滦东地区，到1945年春深入“无人区”，他带领剧社参加大小数十次战斗，在路南港心庄歼灭日伪军百余人，在丰滦汉伏击战缴获300余发子弹，1944年一年间，剧社行军1800公里，直接参战8次。黄天自豪地说：“我们是一支做文艺工作的游击队，不战斗不能生存，更无法进行工作，这是我们的特点，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地方。”

黄天坚持将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，到任后首个长篇报告便宣讲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，提出“把艺术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武器”。他带头深入生活、扎根群众，从房东婆媳的争执中得到启发，连夜创作歌剧《夜深人静时》。以母女的哭诉揭露日军暴行，歌颂军民鱼水情，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。基层干部感慨：“演一出戏、唱几首歌，比开几天会都管事，扩军、支前、锄奸，群众都积极参加。”

为激发团员的创作信心，黄天打破文艺理论的壁垒，用冀东民兵的斗争事迹举例，将深奥的“三一律”创作规律讲得通俗易懂，鼓励大家“把斗争中感受最深的写出来，就是最生动的作品”。在他的启发下，团员根据遵化民兵事迹创作话剧《三百人和一条枪》，成为贴近战场，鼓舞

士气的佳作。1945年春，冀东军区升格为冀热辽军区，黄天倾注心血扶持各分区组建剧社，输送骨干、培训演员，让革命文艺的歌声响彻燕山深处、滦河两岸、长城脚下，为后续进军东北、收复失地奠定了坚实的文艺基础。

凝聚之力： 扎根生活的创作

尖兵剧社初创时，演出多是延安、晋察冀的经典剧目，虽能鼓舞士气，却与冀东现实结合不够紧密。黄天深刻理解抗日军民渴望看到身边生活与斗争的诉求，在繁忙的工作与战斗之余，带头搞创作，始终遵循“生活是沃土，人民是母亲”的原则，将深入群众、熟悉生活作为创作的前提。

每到一宿营地，他必访房东；每接触一支部队，必与官兵交谈，口袋里的笔记本记录着点滴素材，即便在夜行军的间隙、深夜的油灯下，有了创作灵感也立即记录下来。为创作大型歌剧《地狱与人间》，他两次深入“像史前时代一样荒寂”的无人区，与群众穴居野处、忍饥受冻，将外衣、干粮送给苦难乡亲，仅带着空心棉袄归来。这部作品成为尖兵剧社的代表作，真实记录了冀东人民的艰苦斗争，被军区首长指定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大会的演出剧目，抗战胜利后曾在敌占区大城市公演，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灵。

尖兵剧社成立一周年的时候，黄天写下了一篇作品《战斗的第一年》：

这一支年青的文艺游击队，光荣地肩负起新文艺运动的使命，在民族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第七年那天，加入了冀热辽对敌总的战斗阵营，在冀热辽边区和人民对敌英勇斗争的斗争中，伸出了一只小小拳头。

我们一出场就把艺术作为团结人民，教育军民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的武器。我们同时也把握了第一种武器——三八大枪，来保卫了艺术，使它更广泛地开展艺术战场。我们不但演出，我们还需要战斗，用战斗来保卫艺术，用战斗来丰富我们的艺术。一年来，我们紧紧地跟冀热辽的军队、人民生活在一起，天天和敌人周旋，天天打击敌人，主动地参加了八次战斗。在昌黎平原上追杀敌人，缴获了敌人的马步枪；在丰滦汉的伏击战，得了敌人三百余发子弹；在滦河北道遭遇战中，我们一个小同志，在战场上缴获了两个治安军的枪而负了轻伤。我们清楚的认识，我们是一支做文艺工作的游击队，不战斗就不能生存，更无法进行工作，这是我们的特点，也是我们引以为光荣的地方。我们真正响应中共中央和军区的号召，把我们的艺术推进敌人的炮楼里去。我们真正在战争最前线，炮火中，战场上，丰富和锻炼我们自己。当战斗来了，我们在战壕里，我们在山头上，我们在村里组织担架。那时就把提督背起来，端着枪，顶子弹，监视着敌人。那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是文艺工作者，而是革命战士，只有保卫祖国，消灭敌人的决心。当情况过去了，或敌人被消灭了，马上背起大枪，换下胡琴，到村子里拉唱起来，演起戏来。我们就在这样战斗和战斗的工作中走过了这第一年。

我们同时以无限的敬意来感谢冀热辽每个子弟兵和人民。他们这样的热爱着我们，在各种情况下掩护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一年来使我们这支游击队，不但在工作中胜利，战斗中胜利，而且我们更健全起来、壮大起来了。

冀热辽的环境这样紧张，战斗这样频繁，这一群年青的文艺工作者，以无限的热情与忠诚，克服了主观和客观的困难，把新文艺工作迅速地展开在敌伪统治很久、奴化文化思想腐蚀很深的冀东人民的心田，我们的新文

艺呼唤起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。当人民初听到我们歌声和戏剧，他们几乎乐得流下泪来。因为在极端残酷统治压迫下，从没有敢舒展他们的心情。他们把眼泪往肚子里咽，把苦痛埋在心底。今天不同了，从有了八路军那天起，他们挺起胸膛。有了新文艺的感染，他们歌唱跳舞，在今年春季冀东的村庄复活起来了。新的歌曲已经飞翔在冀热辽的军队和村庄。他们看八路军的戏，比他们下地还关心。我们每在一个村子演剧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不是周围几十里地的老乡骑着毛驴，套着大车，奔向那儿去。

……

这一年，尖兵剧社创作剧本58个、歌曲60首，出版歌集6册、刊物3期，还组织了83场演出、105次演奏，观众达13万余人次，让被日军压抑多年的冀东大地，重新焕发出革命的生机。

黄天还以熟练的英、德、法等多国语言，为国际反法西斯友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45年初，美国盟军一架B29轰炸机坠毁在冀东，7名飞行员被八路军救护，黄天接到命令后立即赶来，兼任翻译并组织剧社赶排欢迎节目。演出中，尖兵剧社用爱尔兰民歌旋律填写新词，歌颂中美人民的战斗友谊，美国飞行员深受感动，称赞八路军是“有文化的神兵”。黄天向他们介绍八路军与尖兵剧社的战斗事迹，这批飞行员后被护送到延安，受到毛主席、朱总司令接见，这段友谊佳话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合作的珍贵记忆。

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黄天利用战斗间隙创作了十几个剧本，《满洲泪》《沟线上》揭露日军暴行，《拥军模范于平》《前门后户》歌颂军民深情，还有《庆祝开辟第二战场》等大量战斗性歌词，这些作品扎根冀东大地，充满对人民的爱、对胜利的向往，成为打击敌人、鼓舞军民的有力武器。

尖兵剧社的宣传工作，让日军闻风丧胆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惊呼：“文化八路大大的厉害，他们的剧社和印的报纸，与地雷、机枪一样可怕！”剧社的演出不仅唤醒了群众，还感化了不少伪职人员，一名伪军小队长看后幡然醒悟，率队反正，投向抗日阵营。

大节不辱： 血洒杨家峪，英名永流传

1945年7月3日，抗战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，黄天与军区副参谋长才山率领先兵剧社、长城剧社60余名同志，由遵化县支队护送，开赴玉田参加冀热辽军区抗战纪念活动，准备演出黄天的力作《地狱与人间》。队伍从迁安团汀出发，穿越平唐公路，跋涉百余里至深夜，因人困马乏，临时决定在杨家峪村宿营，却不料被1700多名伪热河警察讨伐大队团团包围。

天将拂晓，枪声骤起，黄天、才山等领导同志冒着密集弹雨组织突围，制定“警卫部队在前，女同志、小同志在中间，有战斗经验的断后”的方案。黄天虽无多少战斗经验，却主动冲到后面掩护大部队，大部分同志成功脱险，而黄天等十几名掩护人员却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。

面对敌人的劝降与叫嚣，黄天坚守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民族气节，秉持共产党员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的铮铮铁骨，他怒视逼近的刺刀，从容烧毁随身携带的文件，随后饮弹自尽，壮烈牺牲。一同牺牲的还有才山、孟昭、今歌等同志，以及30多名遵化县支队战士，这便是悲壮的杨家峪战斗。

同志们找到黄天的遗体时，他的嘴角仍带着淡淡的微笑，仿佛还在构思新的创作。乡亲们献出寿材，用白酒洗净烈士的伤口，怀着崇敬与哀痛将他们安葬。此时，距离抗战胜利仅有41天。

抗战胜利后，尖兵剧社为黄天等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，松柏扎成的花圈、悲壮的哀乐，诉说着同志们无尽的哀思。为纪念烈士，尖兵剧社后来长期以“七〇四部队”为代号，铭记1945年7月4日这个悲痛的日子。1985年，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，黄河、管桦、刘大为等26位当年的抗战文艺工作者重返冀东，在冀东烈士陵园黄天烈士墓前献上纪念花瓶，寄托对战友的无限崇敬与怀念。

黄天的一生，是为革命文艺事业奋斗的一生，他将文艺与抗日斗争紧密结合，让革命文艺在敌后战场生根发芽、绽放光芒；他用生命践行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为中国抗战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他的生命虽短暂，却如璀璨的星辰，闪耀在中国革命文艺的史册上，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文艺工作者，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，为时代放歌、为人民创作。

黄天（1907—1945），上海崇明人，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活动，1937年进入延安陕北公学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团长、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、晋察冀军区文艺科长、抗敌剧社副社长、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社长等职。他是中国抗战文艺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，将文艺与抗日斗争深度结合，让革命文艺成为团结人民、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。1945年7月，黄天在遵化杨家峪战斗中壮烈牺牲，用38岁的青春与热血，践行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信仰。

不解之缘： 与文艺相融的青春

黄天原名黄廷权，1907年生于江苏省崇明县谢家镇南郊（今上海市崇明区新民乡卫东村），家中耕读相传，文化氛围浓厚，先后走出数位大学生。他幼读私塾时便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，1926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，回乡时常召集亲友孩童排戏演戏，在校园中更是深入接触话剧艺术。

复旦大学的复旦剧社是中国话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校园团体，由著名戏剧家洪深创办。黄天在校期间，参演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《一只马蜂》等经典剧目，系统学习编剧、导演、剧务等专业知识，打下了扎实的艺术功底。1931年毕业后，黄天任职于浙江省建设厅昆虫局图书馆，担任主任一职。工作之余，他深耕戏剧事业，1935年与好友徐信等组建“三五剧社”，自编自导自演《湖上的悲剧》《名优之死》《雷雨》等剧目，还将京剧《打渔杀家》改编为现代话剧《讨渔税》，创作《尤三姐》等剧本，主编《戏剧周刊》。数年的戏剧实践，黄天的艺术修养与创作能力得到全面锤炼，为日后投身抗战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无悔抉择： 弃安逸赴延安

黄天生性文静却正直倔强，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影响，自幼树立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，求学时将原名黄廷权改为黄廷材，寄寓以真才实学报国、不趋炎附势的理想。在杭州工作期间，他博览群书，研读鲁迅《彷徨》《呐喊》、高尔基《母亲》等著作，接触《共产主义的ABC》等进步读物，思想上愈发向往革命。

彼时的杭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，黄天目



黄天（前排右一）等冀热辽军区八路军与获救的美国飞行员合影。



1944年夏，黄天带队深入到渤海之滨与战士们一起进行文艺演出。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